

每次新技术、新模式改革都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新的东西最后是要胜利的,但道路是不平坦的。不能因为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对旧的秩序产生冲击,就限制共享经济的前进步伐。

拥抱共享经济还需迈过几道坎?

本报记者李惠钰

出门旅游,你可以在 Airbnb 上搜索当地喜欢的民宿作为落脚点;出行打车,点开 Uber 输入目的地,一辆私家车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想在家吃大餐,动手指米其林大厨便可上门服务……

作为互联网下的新经济形态,共享经济正在悄然改变甚至颠覆着传统商业模式,如今正迅速从最初的交通、租住渗透到金融、餐饮、物流、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在国内,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国家“十三五”规划,共享经济都被屡次提及。5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数博会”再次提出要发展共享经济,因为“只有共享,数据才能无限放大”“共享经济作为新业态,假以时日将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大力量”;不仅如此,共享经济还让每个人都有平等创业的机会,“让人人都能受益”。

当前,共享经济就如同2014年的互联网金融与2013年的O2O(线上到线下)一样,正处于爆发的前夜。不过,中国要想迎接共享经济浪潮,似乎并未做好充足的准备。

西方模式难复制

什么是共享经济?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全景解读报告》给出的解释是:公众将自己的闲置资源,通过社会化平台与他人分享,进而获得收入的经济现象。

“共享经济绝对不是免费经济,而是一种高效经济,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作为政府高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对共享经济的预期就很乐观。他认为共享经济是经济的一种新机遇,将会对促进社会发展、改善民生及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巨大意义。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以租代买,资源的支配权与使用权分离,以网络为载体匹配了更多的需求,使闲散的社会资源得以重新整合利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面对这一亟待发掘的商机,全球涌现出大量的共享经济创新型企业在。在2015年全球“独角兽”俱乐部前十名中,共享经济企业就占据四席,分别为Uber(共享出行)、Airbnb(共享住宿空间)、滴滴快的(共享出行)、WeWork(共享办公空间)。

可是,相对于共享经济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发展,国内的步伐似乎还是慢了一拍。除了滴滴快的之外,大体量的共享经济企业并不多见,涉足的领域也较国外少。

“共享经济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有很大的相关性,文化的差异是中西方差距的主要原因。”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吕本富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分析,不同的文化氛围和思维方式会导致不同的用户习惯。西方人善于社交与分享,对于在陌生人家借宿等事情无太多的心理障碍;而在中国,很少有人愿意在陌生人的房间过夜。

曾任诺基亚西门子网络大中华区商业咨询总监的虞仲轶,目前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从事数字创新与商业转型的咨询与研究。据他分析,大部分的共享经济商业行为都会与不曾相识的人打交道,但国内人际信任基础相对薄弱,同时缺乏可靠的个人信用体系以供参考,因此在某些领域就会存在西方成功的商业

模式无法移植的问题。

国内的共享经济起步本身较晚,在共享出行以外的其他很多领域都还在学习和培养用户习惯的阶段。不过,诸多业内人士仍对国内共享经济的发展潜力十分看好,甚至认为其市场推广和扩张的速度或许将比美国更加迅猛。

但正如吕本富所述,“共享经济在中国会有自己的特点”,衣食住行都可共享,相比西方,中国在“食”和“行”会更具优势,因此并不需要一味地照搬西方模式。

共享遇壁垒

虽然共享经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价值奇迹,但失意者也比比皆是。

澳大利亚研究机构协同实验室就曾对过去两年全球范围内从事共享经济商业失败的企业进行过总结,发现主要失败原因包括规模无法扩大、价值主张不清晰、资金链断裂、遭遇监管或政府限制、产品缺陷、市场尚不成熟等。

在国内“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大环境下,虽然共享经济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也不得不面临来自监管机构与传统势力的多重挑战。

“在中国鼓励共享经济的法律法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需要变革的。”在吕本富看来,共享经济在我国正面临许多的政策限制。“国内衣食住行都有传统的行业法规,比如行业的准入制度、经营限制、许可制等等,那么在共享经济条件下,这些进入门槛是不是就要重新思考?比如邻居家做饭,是不是也需要办卫生许可?”

当然,监管难题及政策滞后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是共享经济共同面临的“成长的烦恼”。除此之外,共享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还暴露出其他问题,例如在税收方面对传统经济构成不公平竞争,对劳动者缺乏“安全网”保障、对消费者利益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及大数据壁垒可能导致新的行业垄断等。

“每次新技术、新模式改革都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新的东西最后是要胜利的,但道路是不平坦的。”在日前召开的“新经济新动能——共享交通专题研讨会”上,刘世锦认为,不能因为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对旧的秩序产生冲击,就限制共享经济的前进步伐。

以网约车为例,“共享出行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创新提高了闲置汽车的利用率,是经济的一种新机遇。各个地方政府首先要处理好利益关系,想是摁不住的,要向前看,向前走。”刘世锦说。

如何拥抱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创新浪潮,对传统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就像《新资本主义宣言》作者乌马尔·哈克指出的,如果传统消费减少10%,而共享消费增加10%,那么传统企业的利润率将受到显著影响;如果传统企业不能进行改变,甚至可能会被淘汰。

那么,站在风口上的传统企业又该如何拥抱共享经济,如何才能发现新的 Uber 和 Airbnb?

“传统企业一定要有开放的数据平台,一定要能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如果不具备这些因素,那么想拥抱也没有这个条件。”吕本富直言,不具备互联网创新的基因,也缺乏必须的人才和足够的技术,传统企业探路共享经济困难重重。

虞仲轶则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对于尚无力量建立自己的共享经济模式,但已经看到共享经济潜力的传统企业,可以转换思维,尝试一下是否可以利用共享经济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客户或者收入。最简单的第一步就是与共享经济企业合作,将其视为自己的一个新销售渠道。

国内如今也有不少传统企业成功开展了共享经济的有益尝试。万科就打造了具有垂直概念的建筑设计师联合办公社区,建筑设计师可以拎包入住,与其他设计师们共享办公空间;海尔集团也尝试使用共享运输的模式来取代庞大的运送车队,拥有送货车辆的小企业甚至是民众都可以利用其平台上的竞标客户订单提供送货服务。

虞仲轶表示,共享经济并不局限于创业型企业。共享经济的本质在于有效盘活存量资源,用好社会上的闲置资源,提供更好的供需匹配,从而为用户创造更大的价值。这种思维对于面临激烈竞争与各种颠覆的传统企业非常之宝贵。

而在吕本富看来,现如今共享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如同电子商务发展初期一样,因此,他建议可以将中国发展电子商务的经验平移到共享经济,先降低门槛促发展,然后再分类管理规范化。



白春礼视察中央控制室

白春礼视察中科院机关办公楼施工现场

本报见习记者李晨阳5月27日傍晚,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到中科院机关办公楼整体综合维修施工现场视察慰问。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办公厅主任乔均录、办公厅副主任黄从利等陪同视察。

竣工在即,黄从利向白春礼详细介绍了办公楼的功能布局及设计构思等情况。白春礼肯定了设计中的创意和匠心,并提出一些嘱咐和建议。对新修食堂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地方,白春礼就诸多细节进行了询问。白春礼着重称赞了维修过程中厉行节约的作风。其中一些大型会议室的木质地板全部“淘”自整修前的旧办公室。地板品质既佳,

又减少了装修消耗和污染。

据悉,此次综合维修的重要目的在于加强办公楼的消防、安防保障,并赋予建筑节能等新特性。

因此,一层中央控制室是此番整修的重点区域之一。白春礼到达中控室后,详细询问了安防监控系统和应急报警系统的情况。工作人员则现场演示了警报启动的预警效果。

在此之后,白春礼与几位陪同人员进一步探讨了消防演练、人员培训等安全实践问题。

记者了解到,财政部为此次维修拨付专项资金5770万元。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资金

使用效率,中科院办公厅特地从国管局推荐的合格供应商目录中聘请了两家第三方中介机构。

维修于2015年6月启动,到当前为止,已进行12个月。其间因庆祝抗日胜利70周年阅兵、2次雾霾、亚投行成立等情况停工两个半月,真正有效施工时间为9个半月。

目前,整个工程进度已完成99%,正在组织验收。预计7月1日,机关工作人员就将正式回到三里河园区办公。

视察的最后一站,是白春礼自己的办公室。匆匆了解情况后,白春礼还坐在办公桌前,处理文件资料。

莫让制造业单项冠军再“隐形”

程楠

最近,一款德国产的水过滤器大卖,虽然价格不菲,却供不应求。其生产商德国布朗塔公司曾说过:在我们开发水过滤器之前,压根没有这个市场。

布朗塔公司就是一家典型的“隐形冠军”企业——做出了颠覆式、市场开创引领式的创新,并在这一细分领域持续深耕积累。

“隐形冠军”企业最早是由德国管理大师赫尔曼·西蒙介绍为人所知的。同微软、谷歌、苹果、西门子等巨头不同,这些企业是一群社会知名度相对较低,但产品在国际市场份额中却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小型企业。

笔者认为,“隐形冠军”企业对制造业乃至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我国需要更多这样的企业,但现阶段对于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建设制造强国来讲,不应该让这些企业再“隐形”。

何为“隐形冠军”

德国企业豪耐也是一家典型的“隐形冠军”企业,其生产的高速香烟机占据全球90%市场份额。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有三条标准:产品在国际市场份额中占据第一或第二的位置,或者占据欧洲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鲜为人知的中小公司,年销售收入不超过10亿美元;社会知名度一般很低。

“隐形冠军”企业的目标定位就是“冠军”、市场定位高度聚焦、专注狭小的细分市场、专注核心客户,只讲深度开发不讲广度进军,不停创新,关键工作自己承包。

除了产品核心零部件,很多隐形冠军企业甚至主要生产装备和工具都在企业内部研发生产,因此很难被仿制。

此外,“隐形冠军”企业的员工往往忠诚肯干。德国“隐形冠军”员工的工作年限大多在二三十年,员工平均病假率不到5%,而大众、奔驰等知名企业则在8%以上。

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对经济和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西蒙抽样调查的德国500家“隐形冠军”企业在德国市场萧条时也能保持高于一般企业的增速水平。并且有助于带动提高国家的出口能力。2014年,德国外贸出口额超过1.1万亿欧元,再创历史新高,贸易顺差达到2170亿欧元,位居世界首位。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在创新产品的同时推动了生产设备、工艺、技术、核心零部件等的创新,不断创新促进了产业升级。此外,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态度帮助德国树立了“产品质量绝对过硬”的品牌形象。

夭折的“隐形冠军”

明珠星是全球最大的石英钟制造企业;珠江钢琴是全球最大的钢琴生产企业,在美国和德国的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25%和11%;乐美文具是中国最大的中性笔生产商……

实际上,我国已有一批企业成长为“隐形冠军”,还有一批走在通往“隐形冠军”的路上。

异言堂

在刚刚闭幕的201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峰会(即“数博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贵州以“西部欠发达省份”蜕变为后发赶超的“贵州样本”有一段生动的论述:

“贵州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上,把‘无’生了‘有’,也让贵州围绕信息技术的先进产业业态产品绽放了活力。贵州的发展和变化,说明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所代表的新一代互联网发展趋势背景下,所有国家和地区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落后地方甚至可以抢占先机。”

在大数据技术领域的创新创业,让贵州这个以往和高新技术不沾边的欠发达省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许多人不解:各地都在大力发展大数据,贵州何以异军突起?

贵州高新云计算有限公司是一家2014年在贵州落地提供云计算服务的大数据企业,从其总经理许宁的感受中或可找到答案:“贵州最打动我的就是政府的群体奋进意识甚至超越企业。这种思维动能的改变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

业界认为,贵州能够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弯道取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贵州政府正在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在产业布局、产业选择、产业培养时,只有专业化的政府才能进行市场化的研判、调研和决策,进行市场化的推动,促进技术经济产业快速发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几天来,华为外迁的消息引发热议,“别让华为跑了”的讨论几乎引爆了技术产业园。尽管华为官方辟谣称“华为从未有计划将公司总部搬离深圳”,但深圳龙岗岗公区工作人员们的担忧并不会因此消失——企业创新创业成本高昂、发展空间逼仄,已经成为掣肘当前技术产业大举拳脚的重要因素。

近几年,一些企业搬离某地,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一些高耗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甚至停产,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另一个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很容易在土地财政模式和打造专业化服务型政府之间选择前者,忽视了政府在培育创新创业土壤方面的关键作用。

不可否认高新技术产业在一线城市有许多便利,比如易获得的人才和社会资源等,然而,政府公共服务的欠缺、高房价对企业和人才的挤压,正成为很多地方在发展和转型中的通病。

其实华为可以永远不跑。前提是深圳必须做好自己,打造专业化的服务型政府,以服务者的姿态倾听时代的声音,正视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充分了解企业的诉求,稳步快速地推进改革,重塑创新活力和创业氛围,才有可能转危为机,再创新辉煌。希望“别让华为跑了”这记不仅为深圳而鸣的警钟和“贵州样本”的范例,能让各地政府领悟到其中的危与机。

「贵州样本」与「华为不跑」背后的逻辑

赵广立

